

WEN SHI JING HUA

中日风云录



识时务华盛顿与北京订和约

尼夷松访华日本朝野大

震焉 田中“求其友声”周

思豪迅速反应 日本的基

辛格 说历史悠悠掩掩

猛醒悟日本别无选择

小日本欺人瞒世

南京政府丧权辱国

日本得寸进尺 中华战火四起

集近代现代史料之精华

述亲历亲见亲闻之故事

珍藏新经典

文史精华

集萃本

日本欺人瞒世 南京政府丧权辱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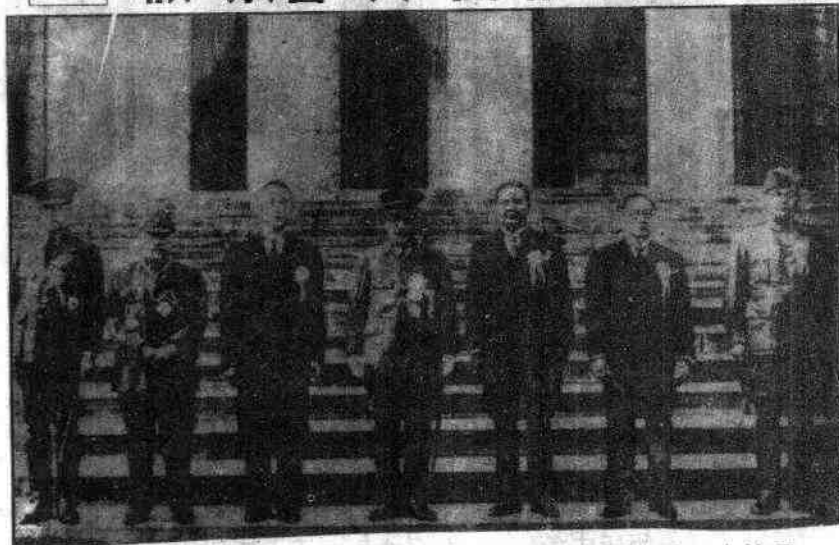
日本驻
使说：
全世界
闭上眼
睛，转过
身去，让
日本以
自己的
方式解
决问题。



1942年5月9日，汪精卫在访问“伪满洲国”时在欢迎会上讲站。

25

假“亲善”真“侵略”，老蒋被迫抗日



和平有
和平之
限度，
牺牲有
牺牲之
决心。

——蒋介石

1943年11月5日参加大东亚会议时的汪精卫。中为日本首相东条英机。

EA34/50

51

蒋介石躲进了峨眉山，却得了一个“四强”的荣誉。

公元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其时已是抗日战争开始4年有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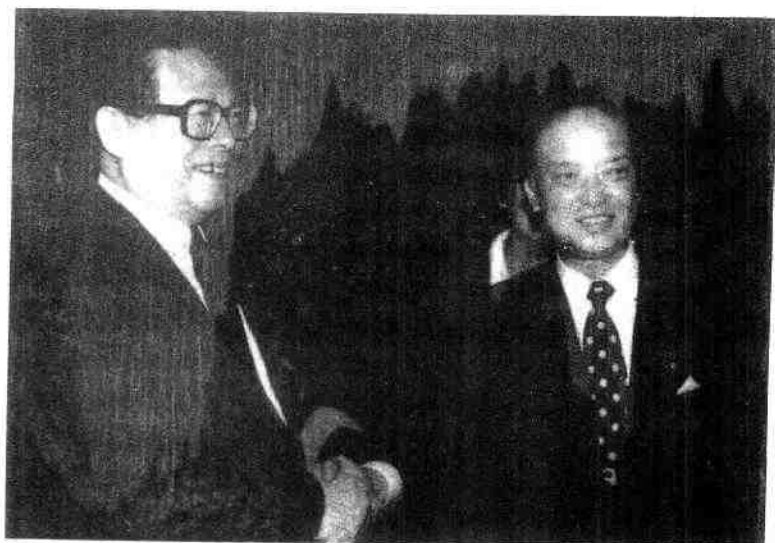
1941年日本特命大使多摩太郎“拜谒”华北汉奸头目王揖唐。

91 识时务华
盛顿与北京订
和约，猛醒悟日
本别无选择

1972年9月29日，对于中日两国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这一天，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1972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中)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右)



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问中国时与江泽民总书记合影。

119 警惕! 不散的“军 国阴魂”在 作怪

信赖产生
友爱,友爱产生
对话,对话创造
和平。只有满怀
诚意,信赖才会
产生。

——摘自日本社会
党一名领导人的演讲

汪精卫登台献丑,蒋介石忍气吞声

文史精华(96 增刊) WEN SHI JING HUA

主办单位: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文史精华》编辑部

主编:徐俊元 副主编:石玉新

法律顾问:金佩莹

社址:石家庄市维明街 34 号

邮政编码:050051

国际刊号:ISSN1005—4154

国内刊号:CN13—1166/K

增刊号:冀新出刊增字(96)第 007 号

邮发代号:18—212

广告许可证:冀工商广字省直第 048 号

排版:石家庄方正计算机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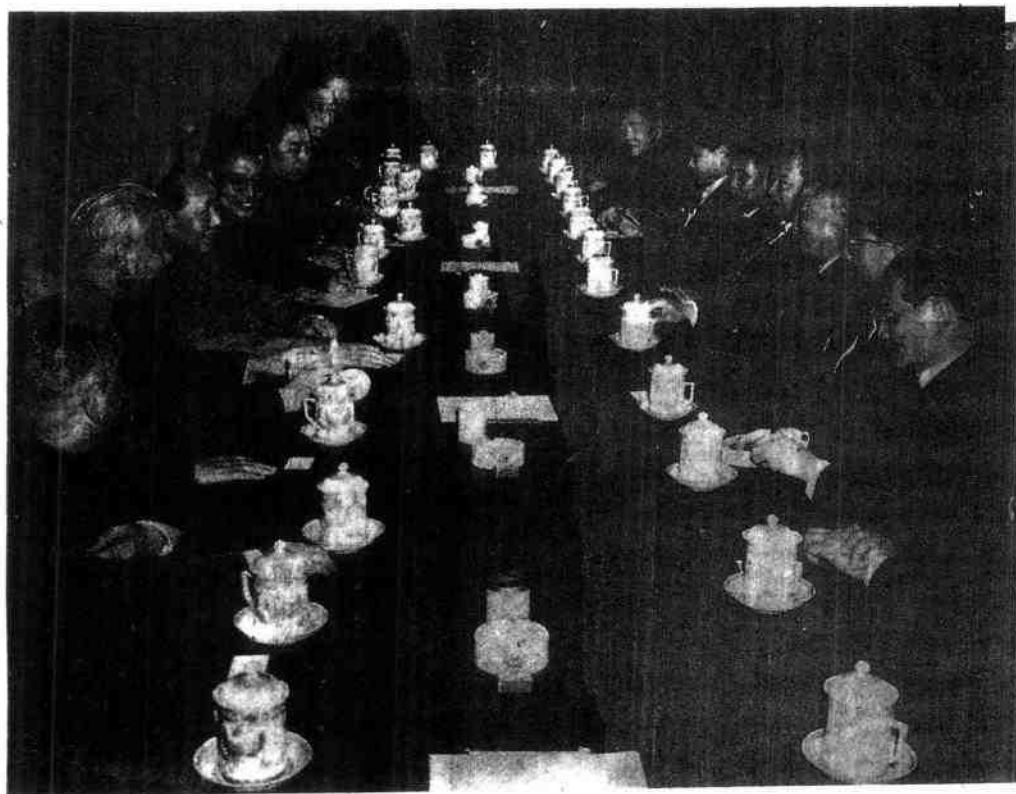
电话:6058729 6041515

印刷:河北省新华印刷三厂

定价:29.70 元(单册定价:9.90 元)

蒋介石慷国人之慨， 对日本人“既往不咎”

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田中奏折》



田中设计侵华“蓝图”

1927年，日本爆发空前的金融危机，加藤内阁因经济

困境和在对华关系上被指责实行“对外软弱”而倒台。4月20日，素以强硬侵华派而著称的田中义一，以政友会总裁身份组阁，出任首相兼外相。

森恪任外务省政务次官，成为“实际上的外相”。日本由“币原外交”进入“田中外交”时期。

田中义一出生于日本长

州藩一个破落土族家庭，曾就学于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他由陆军中尉一步步升至陆军大臣，他继承长州军阀山县有朋的衣钵，积极奉行侵略大陆的政策。1916年，担任参谋次长的田中就主持制定了“满蒙独立计划”，并插手发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如今他登上首相宝座，就更下决心推行其向中国扩张的一贯主张。

田中义一推行对华强硬政策的序幕是出兵山东。为阻止蒋介石渡江北伐，5月16日，日本第二遣外舰队开往山东沿海。22日，南军攻克蚌埠，向徐州推进。27日，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决定出兵山东。6月1日，日军在青岛登陆，待机扩大侵略。

田中上台的第二步棋，便是召开所谓“东方会议”，规划日本侵华的总蓝图。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内阁在东京霞之崎外务大臣的官邸召开会议，讲座并决定“积极的对华政策”。参加会议的，除田中义一本本人外，还有日本驻华公使，驻奉天、上海、汉口等地总领事，关东军司令官，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官员等。

在这次会议上，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在侵华，特别是在侵略东北的策略上产生意见分歧。以满铁总裁山本太郎为首的一派主张用“内科的方法”，即以外交的、经济的手段捍卫

和扩张日本在华，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权益；而森恪等人则主张用“外科的方法”，即用军事手段进行侵吞，达到一举占有“满州”或中国的目的。最后，田中首相折衷以上两种意见，发表了《对华政策纲要》的训令。主要内容是：

一、将所谓“满蒙”和“中国本土”分别对待。也就是说，日本要不惜一切手段，把整个东北地区从中国主权下分裂出来，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区”，置于日本保护之下。

二、针对中国当时局势，坚决排斥共产主义，支持和同情国民党“稳健分子”，建立统一政府，但仅限于所谓“中国本土”。对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暗示将采取“欢迎之态度”。

田中训令声称：当日本在华权益有遭到“非法侵犯”的危险时，万一动乱波及满蒙，使日本在该地区之特殊地位与权益受到侵害时，日本政府将根据需要，断然采取措施，不问其来自何方，均坚决加以防护，“即使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

田中的纲领，火药味已经很浓。战争的保险闸已经打开，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东方会议结束不久，田中义一将会议的方针政策拟成一个秘密文件，即《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于7月25日上奏天皇。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田中奏折》。《奏折》中说：“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

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如果我们征服了中国，其他一切亚洲国家和南洋各国将会惧怕我们而投降，那时，世界将会理解东亚是我们的，并且不敢侵犯我们的权利。”而掌握“满蒙”权利和掠夺中国资源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和《奏折》中替日本帝国主义的“蓝图”。日本人迈着整齐的步伐，开进美丽富庶的“满蒙”，然后占据地大物博的中国大陆，进而踩着美国人和苏联人的鲜血，征服宇宙中这颗美丽的星球——地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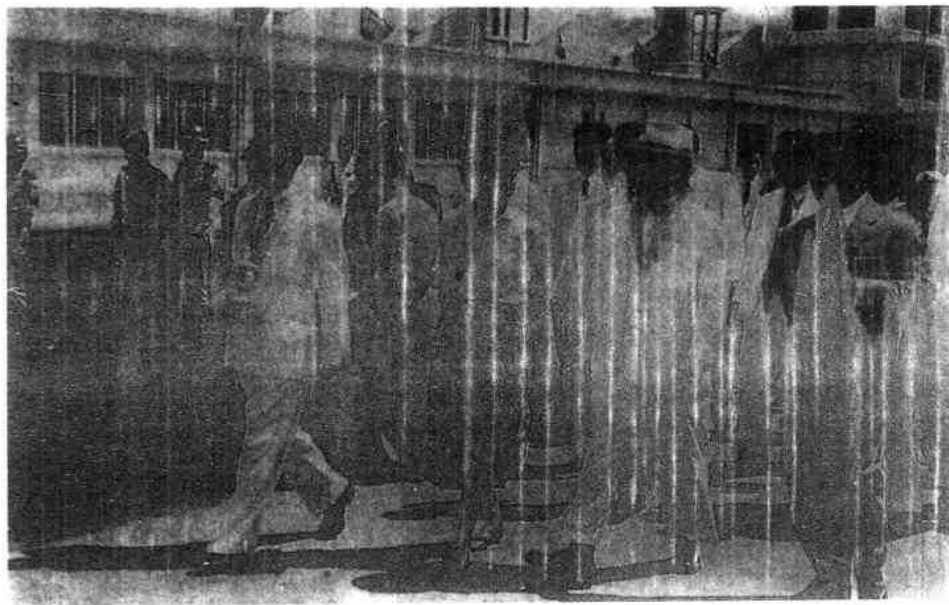
然而，历史的发展，永远不可能以个人的意志而转移。历史的轨迹表明，田中义一设计的“蓝图”，不幸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自掘坟墓的路线图。

蒋介石苦吞东洋果

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的大片富饶土地，意欲侵吞之时，中国的政局还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派系林立，军阀割据。

1927年8月12日，蒋介石因受孙传芳、张宗昌直鲁联军南攻，武汉方面的威胁，桂系的貌合神离，加之日本出兵山东的威胁，决定暂避锋芒，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宣告“下野”。

9月28日，蒋介石东渡扶桑。他这次去日本，说是要



集团军开始。

国民党新
阀同奉系旧军
大规模战争迫在
眉睫,这又引起日
本政府的极大恐
慌。田中命日本驻
沪总领事矢野七
郎转告蒋介石。

如果在沪南
附近发生战争,日
本便会出兵,希望
北伐军避开济南
北上……”

蒋听了,不由

倒抽一口冷气。

4月19日,日本紧急临
时内阁会议通过《第二次出兵
山东案》。由福田彦助中将率
领的日军第六师团首批部队
从日本门司出发,4月25日
在青岛登陆。27日,日军第六
师团共5000余人全部抵达青
岛。

5月1日上午9时,北伐
军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开进
济南,蒋介石“唯恐发生事故
急速赶往济南”,于次日上午
9时到达,设总司令部于原督
办公署。两小时以后,日本第
六师团进入同一座城市,设司
令部于西门外商埠区。派第十
一旅团进驻商埠区,进入临战
状态。日军四处挑衅,制造冲
突,战争一触即发。蒋介石命
令部下:“无论如何有事,亦须
忍受”,“对日本人,绝对不开
枪”,“日本要求枪支即以枪支
与之,要求作俘虏时,即听其
捕作俘虏”。

宋美龄结婚,需要去日本征
得在那里疗养的宋母的同意。
但更重要的是要赴日本摸清
日本对华政策的底细,争取日
本政府的支持,以助他重新上
台。

他在日本与朝野各方面
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11月5
日,他来到田中的青山私宅,
这是他来日本很重要的目的。

蒋把田中看作“自己的前
辈”,以师长相待,两人长谈两
小时。田中要蒋介石“从大局
着眼,先行整顿江南秩序。清
除共产党这个隐患。统一南
方。”并劝他:“巩固自己的地
盘不必过份着急于北伐。”蒋
介石对田中要他不可立即进
行“北伐”的意见,表示“完全
抱有同感”,但表示“在南方
巩固以后,再行讨伐北方”,并
要求日本不要支持张作霖,要
帮助他“早日完成革命”,并允
诺“真能如此,满蒙问题也便
容易解决。”

田中对蒋的意图并不赞
同,他希望中国出现“南北划
江而治”的局势,蒋介石“统
一南方”,北方仍由张作霖统
治,实现“蒋张联盟统治”,日
本就可以独霸中国了。这与蒋
介石“统一中国”的政治野心
存在着矛盾,而如果蒋介石抛
弃了“北伐”这面旗帜,就等
于丢掉自己的“革命”和起家
的政治资本,他“统一中国”的
政治野心也无法实现。

日本田中内阁支持蒋介
石,又限制蒋介石的策略,本
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两
人会谈也无实质性结果。

蒋介石11月10日回国,
12月1日与宋美龄正式完
婚。

1928年1月7日,蒋介石
正式复职。不久将国民革命军
改编为4个集团军,约70万
人,分别由蒋介石、冯玉祥、阎
锡山、李宗仁任各集团军总司
令。4月7日,蒋介石命令4个

蒋又通知日本驻济南代总领事西田一，要求日方撤兵和开放商埠区。5月3日上午8时，西田一偕宪兵司令到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拜会蒋介石。西田说：“进驻济南的国民革命军，军纪风纪都很好，并且都很严肃，很守秩序，所以派到济南来的日本军队和宪兵，今天就要撤回去了。”

然而在西田“辞行”后不到15分钟，日军的机枪就响了。

日军袭击贺耀组部第七团，将该团1000多人缴械。

蒋害怕事态扩大，命令各师长约束部队。同时通知福田中将，说是已命济南城外所有中国军队于当天下午5时前一律撤离济南，请他也约束日本军。福田回信说，很愿同中方开一个会，调查今天的冲突，要中方派员到他的司令部去。蒋答复说，日方应派人到他的司令部去开会。争执结果，决定双方代表在一个中间地点——津浦铁路办公处会面。

国民革命军派代表熊式辉。日方代表黑田周一蛮横提出中国军队撤离济南20里之处等无理要求，逼迫熊式辉签字。熊提出要回去请示蒋介石，黑田不许请示。在交涉时，日军每隔两分钟发射一炮。日本哨兵对路上行人随意开枪射击。奉蒋介石之命不准抵抗的中国军队整排整营被缴械，中国军民在枪炮声中尸横遍地，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士兵受

到残酷虐杀。

日军为推卸罪责，威胁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在其捏造的材料上签字，遭黄拒绝。直到他最后签了个“阅”字，日军才放他走。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在济南交涉署内又将战地委员会外交处主任、驻山东外交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职员16人用麻绳捆绑，用枪拴将蔡腿骨打断。蔡扑倒在地，大骂日本军阀。日兵撬开他的嘴巴，将舌头割去，然后用手枪将他打死。其余16人也被枪杀。

事后，日本总领事馆的调查报告说：3日晨，有两名日本士兵被交涉署内射出的子弹击毙。晚上7时许，第六中队队长木庭上尉率领第二小队进入交涉署内搜查。在地下室有携手枪的便衣16人潜伏，突开枪射击，日军仍冲进地下室，将其全体射杀。这就是日本用以掩盖事实真相而编造的拙劣谎言。

5月4日，日军不但继续枪杀中国军民，还出动飞机轰炸蒋介石的总司令部。

5日，日军抢走津浦路第一区100多支枪。同日蒋涵告英美领事馆，北伐军已退出济南，仅留李延年和邓殷藩两个团维持济南治安，此后一切应由日军负完全责任。

6日，蒋介石退出济南。8日，刚上泰山的蒋介石接到福田的最后通牒。福田提出5项条件，包括：有关骚扰暴行之高级武官，处严厉徒刑；对抗

我军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地前解除武装；南军需撤退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两侧20华里地带，以资隔离等等。限令12小时内答复，简直就把中方“当成一个战败国看待。”

蒋介石慌了手脚，一面急电催促王正廷、何成滨赶赴济南与日交涉，一面电令已赴日本的张群会晤田中，要求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中日间的问题。在王、何未赶到时，蒋命战地委员长蒋作宾到济南总领事馆先作口头答复，表示日方所提条件大体可以接受。

但日军炮火未停，并继续进攻党家庄，迫使蒋向泰安退却。同日，日本内阁还向山东大量调兵。

蒋介石已感到无路可走，他把第一军团所属部队调回泰安、大汶口一带，拟作退兵南京之计。

本来，这次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十分顺利，奉鲁军抵敌不住，纷纷溃退，北伐胜利指日可待。由于日军的阻挠，北伐受挫，奉军正待卷土重来。但若是北伐军退回南京，保守江南半壁河山，则南京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外交、军事形势就趋于严峻，南京政府很可能因北伐的功亏一篑而分崩离析。有鉴于此，南京政府特派谭延北上，阻蒋率军南返。

5月12日，南京政府在山东兖州举行党政联席会议。谭延提出，济南问题可留待将来用外交方式解决。北伐军事仍应继续进行。会议提出：对

日仍采取妥协退让方针,同时吁请国际联盟及欧美各国出面调停,绕道渡河,继续北伐。

经济南惨案,蒋胆勇已失,精神沮丧,无法继续率部北伐。他任命冯玉祥为此部队总司令,让其指挥渡河各军。

5月8日,在日军的炮击中,留守济南的李延年团和邓殷藩团被迫反击,殊死战斗3昼夜,死伤官兵千余人。10日,奉命撤出。11日,日军占领整个济南。

日军在济南城内,烧杀抢掠,动辄杀人。他们闯入商店、居民住宅洗劫财物,还到处奸淫妇女。筐市街石巷子靳姓家,闯入日兵5名,将其姑嫂轮奸几乎至死。西关玉皇宫某茶馆内一名13岁少女也遭日军强奸。中国军民在济南惨案中死亡6123人,伤1701人,财产损失近3000万元。

济南惨案实际上是后来南京大屠杀的预演。

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引起全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抵制日化高潮在各地掀起。日本国内一些进步团体也严厉谴责军国主义者的行径,美、英、法等国对日出兵山东也提出抗议。加之南军绕道京汉路北进已取得进展,冯玉祥军于13日攻克德州。日军又调部队赴天津。

蒋介石在国内外反日浪潮的冲击下,不得已出面与日军谈判撤军事宜,其内容主要为:从互换签字日起,两个月内日本撤出山东驻军;济南不

幸事件,认为既往不咎,互不负军事行动的责任等等。

就这样,蒋介石以“既往不咎”与日本达成妥协,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罪行就这样一笔勾销了。

皇姑屯:张作霖的葬身之地

1928年6月4日清晨。一列从北京开来的满载卫兵的戒备森严的专车,呼啸着穿过夜雾初散凉意犹存的辽河平原,向奉天疾驶。5点20分刚过,当专车正要穿过在皇姑屯附近、距离奉天车站仅1里远的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点的跨线桥洞时,突然亮光一闪,接着发出一声震撼大地的沉闷爆炸声,顿时硝烟弥漫,烈火冲天。

专车前部的6号车厢被爆炸的气浪掀翻出轨。挂在中间的了望车和餐车被炸得面目全非,顶棚和窗户全部摧毁。这辆据说是慈禧太后的御用专车,已支离破碎不成车形。

贵宾车上的东三省最高统治者、一度以陆海军大元帅名义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的风云人物张作霖身负重伤。特意从奉天赶到山海关迎接张作霖的黑龙江军务督办吴俊升因头部穿入一枚大铁钉而当场毙命。其他同车的奉系要员刘哲、莫德惠、于国翰和日本军事顾问仪我诚也等人均受轻伤。张作霖从炸毁的车厢里被抬出来后,由副官王

宪武抱着横躺在宪兵司令齐思铭开的一辆汽车内急返大帅府。虽立即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于当日上午9时30分,命归黄泉。

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皇姑屯炸车事件。

是谁杀害了张作霖?

历史的陈迹经过岁月的冲洗,终于揭开了覆盖在上面的一层迷雾。凶手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

他在1928年初奉命制定暗杀张作霖的计划,物色了参加暗杀小组的4个成员:川越守三大尉、工兵科出身的营野大尉和神田泰之助中尉以及东宫铁男大尉。

在确定爆破地点后,河本就命令工兵军官营野大尉精确计算进行爆破所需的炸药数量。要求既要保证彻底摧毁张作霖乘坐的车厢,又不致于损坏桥上通过的南满铁路,避免因危害满铁会社的利益而遭到日本政府责难。营野经过多次实地勘测和反复计算,决定用200公斤黄色炸药实行爆破。

但是,如何把这200公斤炸秘密运到爆破地点,而且要保证在有奉军哨兵巡逻的情况下安装起业,不被发现,这确是个棘手的问题。

河本在一次侦察地形时发现,铁轨旁边排列着垒成3层的几十个沙袋,在近处堆放有满铁会社的铁轨、枕木等筑路器材,看到距此200米远的南面高粱地中,有一间守备队

的哨舍，便突然灵机一动，想出偷梁换柱的妙策，顺利解决了炸药的安装和引爆这两大难题。

河本对守备队长东宫大尉面授机宜，东宫便命部下在夜晚把10个沙袋偷运到自己家中，由营野大尉亲自把200公斤炸药分别装进这些沙袋里，然后再秘密运回原处，依照原来的样子放在其他沙袋上面。这些活动都是在奉军哨兵1小时巡逻一次的间隔中完成的，干得迅速而隐秘。

炸药的引爆装置就设在那间200米外的守备队哨舍里。为了万无一失，特意安装了两个引爆按钮，连接在通往炸药袋的电线上。这样，河本已殚精竭虑，布成了谋杀张作霖的“必死之阵”。

不仅这样，河本为了逃避罪责，嫁祸于人。还在炸车事件发生前后故意大摆疑阵，企图把水搅混，转移世人视线。

早在1928年年初，老谋深算的河本及其助手川越就找到一个名叫中野洋平的本浪人，让他炸毁中东铁路桥梁，叮嘱他只许炸毁铁路，不可损坏列车。不久，哈尔滨和齐齐哈尔附近两座铁桥被炸。于是，哈尔滨的俄系和奉系的中文报纸都纷纷报道这些“原因不明的铁桥爆炸事件”，日本国内报纸也作了报导。所有报纸的论调，都认定“这些奇怪事件可以理解为民众对张作霖政权推行暴政的抗议”，并推测是杨宇霆、吴俊升或张

作霖的部下所为，没有一家报纸怀疑关东军与此事有关。

这次河本大作决定把炸车事件伪装成南方革命军便衣队干的，他叫日本浪人安达找几个流浪汉，谎骗他们被日本特务机关雇佣为侦探。这3个人于6月3日在日本人经营的澡堂洗完澡后换上新衣，领到50日元预付金，都显得很高兴。其中有个叫王谷生的渐觉事情蹊跷，便偷偷跑掉了。

等到晚上，川越用汽车载着两个“替死鬼”运到独立守备营驻地。两人一到即被等候在那里的日兵刺杀，弃尸路旁。人们事后看到，两具男尸身着新灰布制服，穿着黑布鞋。旁边放着一个破搪磁面盆，里面有2颗生锈的小炸弹；附近有一张印着“救国军总司令部公用笺”的字样的信笺，上写“兹派某某等去东

三省一带工作”。这是河本等人想把凶手罪名诬嫁到南方军头上制造的假相。

尽管日本人竭力掩饰事实，但皇姑屯炸车案真相，却很快就被揭露出来。英国路透社曾派专人到出事地点调查，认为埋放炸药、安放引线等需要四五个工兵，工作至少需要6小时，如此众多的工兵，如此长久的时间，守备日军毫无察觉，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个侥幸逃脱的流浪汉王谷生，最后也到大帅府，合盘托出了事情的原委。

“东方会议”后，日本一方面出兵山东阻止蒋介石北伐，另方面向张作霖索取“满蒙权益”，对张作霖软硬兼施，要求对一切“悬案”彻底解决，又要攫取“满蒙七路”的修筑权。张作霖是日本一手扶植起来的，深知日本帝国主义贪得无厌，欲壑难填。他对日本经常



性的无理要求，采取“软磨硬泡装糊涂”的策略，有时拖延解决，有时即使被迫答应也只是私不允诺，避免公开答复。为此，日张之间矛盾一时尖锐起来。

蒋介石北伐战争后，日本见奉系政权岌岌可危，张作霖又不得人心，就已经在考虑如何对待东三省和张作霖的问题了。在如何处置张作霖的问题上，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分歧。陆军部和关东军主张趁张作霖败退时解除其武装促其下马，而田中首相认为张作霖还有被当作傀儡继续利用的价值，以“张作霖的事由我来处理”搪塞过去。

关东军根据东方会议精神，准备解除从关内败退的奉军武装。5月9日后，关东军逐渐向奉天集结，从朝鲜派遣的混成旅团也向奉天集中，尔后，又准备开进锦州。田中考虑到英美列强的压力，5月31日作出延期出兵的决定。这一决定招致陆军部和关东军的不满。河本大作提议：炸死张作霖，制造东三省动乱，再以“维持满州的治安”为名，占领东三省各要地，建立一个“独立”的“自治”政权。他的计划得到关东军的肯定和支持。

皇姑事件后，奉天市民惊慌失措，社会秩序紊乱。日军奉天守备队蠢蠢欲动，到处制造事端，关东军妄图趁局势混乱一举占领东三省。

奉天省长刘尚清限于局势严峻，为安定人心，决定对

张作霖之死秘不发丧。“帅府”人员对保密工作做得相当成功，每日厨房照样开张作霖的饭菜，杜医官天天来府假装换药并填写医疗经过和处方，以瞒过日本人的窥探。日本领事一日数次探听张作霖的情况。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妻子带来一群“日本太太”借口慰问，上帅府探问虚实。见张作霖的五姨太照旧浓妆艳抹，面无戚容，“大帅府”仍灯火通明，“烟霞阵阵”。这群日本太太十足地相信了“大帅”仍活在世上的消息。

事件发生后，张学良6月17日夜秘密回到奉天，21日张作霖发丧。日本一伙军国主义分子乘乱占领东三省的阴谋才没有实现。

日本要张学良当儿皇帝

张作霖死后，东北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东北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始终在张学良脑中萦绕。在决定东北何去何从之前，张学良考虑到必须先巩固自己的地位才能决定东北的命运。1928年6月19日，张学良通电就任奉天军务督办之职。7月2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选张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这样，在其父辈老人的支持下，张学良掌握了东北的军政大权。

当时摆在张学良面前有两条路：或者“易帜”“联蒋”，实现国内的“统一”；或者依靠日本的帮助，继续保住自己在

关外的地位，甚至依照关东军主张，把东北变成一个“自治”区域。张学良深知，后一条路无异于把自己变成日本的“儿皇帝”。日本一直对东北怀有领土野心，在日本的托庇下寻找一块栖息之地，实际上也就等于引狼入室，父亲的悲剧时时在他眼前闪现。他决定“易帜”联蒋。

6月21日，东北当局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不宣布为张作霖发丧。田中训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以哀悼为名拜会张学良。林久治郎劝告张学良：东三省应外御敌人，内修治安，“维持现状”。他狡黠地对张学良说：“如有要求，可直接提出，吾国政府将大力援助。”张学良顺水推舟地说：“回顾在东北三省的中日亲善关系，今后根据保境安民宗旨，努力于两国人民的利益均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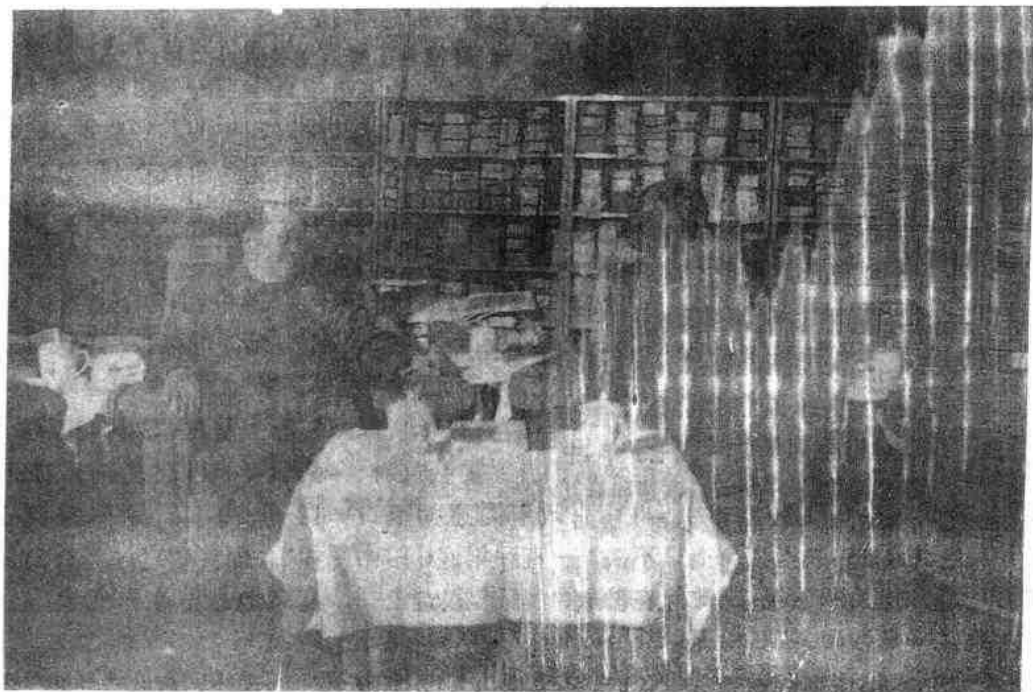
7月1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表示和平统一的诚意。3日，蒋介石对日本东方社会记者发表谈话，声明要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对和平统一，东北方面提出的条件是：

一、南京拟在东北所设的政治委员会，应指派张学良为主任委员；

二、国民革命军不进入东北；

三、南京不干涉东北军政；

四、南京不在东北设立宣传分支机构；



五、热河划归东北

南京方面的条件是：

一、奉军完全撤到关外；
二、东北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三、服从三民主义；

四、东北政治分会主任委员由国民政府委派。

蒋介石单独接见东北和平代表时指出，只要易帜和服从三民主义，其他均可商量。张学良旋即复电同意，表示“愿对政府服从到底”。定于7月24日“易帜”，并要热河汤麟部于7月14日先“易帜”。

消息传出，日本大为恐慌。7月16日，林久治郎警告张学良，与蒋介石合作等于同日本对抗。张学良表示只能顺应大势，别无他法。田中第三次训令林久治郎，要他对张学良表示日方的强硬态度。林久治郎19日再访张学良，强烈

反对“易帜”。他说南京政府含有“共产”色彩，地位尚不稳定，东北不应与南方联系；如东北财政上有困难，日本愿充分帮助。

张学良对林久治郎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非常气愤，但考虑到日本强大压力和内部的一些因素，决定暂缓“易帜”。

田中内阁趁热打铁，又派第一次世界大战间驻华公使林权助为特使，以吊唁张作霖为名，劝阻张学良“易帜”。7月21日，田中向林权助详细交待了日本对东北的政策和策略：“满洲”是日本的外围，要防止共产主义势力侵入，不能以牺牲“满洲”为代价支持中国统一；不能使满洲问题国际化；日本在维护“满洲”的利益时，敢于不惜牺牲，将根据需要采取“相当手段。”

8月1日，林权助在林久治郎的陪同下拜访张学良，传达了田中旨意。8日，林权助劝张学良不要搞南北妥协和悬挂青天白日旗，否则，“田中已具决心，将以强国意志自由行动。”9日，张学良同林权助和林久治郎继续会谈。林久治郎撕破职业“外交家”的文章彬彬的面孔，对张学良颐指气使，其嚣张情景令人发指。最后林久治郎竟然指手划脚，用命令的口吻对张学良说：“我们就是不许你挂旗。”秘书王家桢照着林久治郎的语气，大声翻译给张学良听，张学良勃然变色，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林权助一看弄成僵局对自己不利，连续出来打圆场。这次会议耗去4个小时，双方不欢而散。

日本“二林”之所以在会谈中胆大气粗，与8月7日日

本政府制定的《满洲形势急变之对应措施》有关。文件中说，如果张学良不听从日本劝告，将断然采取武力自卫措施，驱逐张学良、杨宇霆等“新派”，扶植东北“旧派”。

面对日本一再强行干涉，加上奉天城四周驻有 1.7 万日军，并于 8 月 13 日举行大演习，张学良担心日本武装干涉，不得不再度推迟“易帜”日期。张学良曾于 8 月 9 日致电蒋介石，叙述当天“二林”在会谈时对他施加压力的情况，并提出对策：“一日强硬，二日软化，三日圆滑。强硬则必动武，不但东三省力有不足，就全国协力亦无把握。软化则东三省成为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暂时，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张学良召开东三省保安委员会会议，决定从策略上考虑，延期“易帜”。8 月 13 日，张学良正式通知林权助，在今后 3 个月内东北不“易帜”。

在阻挠东三省“易帜”过程中，日本帝国主义逼迫解决所谓“悬案”，谋求扩大在东北的利益和特权，一直没有停止。林久治郎主张实行“二十一条”所规定的日本人在“南满”居住往来及商租权。11 月，满蒙铁路社长山本来到奉天催促张学良实行修筑“满蒙铁路的承建合同”。张学良以民众运动高涨、保委会反对、须征得南京政府同意为借口拖延不决。一直到年底，田中政府在攫取“满蒙”权益上一无所获。

此时，在国际上，日本政府严重陷于外交孤立。1928 年 7 月 25 日，美国与南京政府缔结新的关税条约，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德、意、英、法等国相继与中国缔结同样条约。11 月 3 日，美国政府正式承认国民政府。12 月 20 日，英国与南京建交。

而日本国内，政治反对派担心田中内阁过分干涉中国

东北会招致西方列强不满，害怕日本在外交上的孤立，因而反对田中的对华政策。在野的民政党为争权夺利，借口田中对华政策失败，加紧了倒阁运动。

田中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无计可施，只得认可东北“易帜”、“为中国内政问题”，实际上是对“易帜”表示默认。张学良瞅准时机，于 1928 年 12 月 29 日，断然宣布“易帜”。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高高地悬挂在东北大本营上空。

至此，东北“易帜”象个难产的婴儿，经过一番曲折之后，终于呱呱坠地。“田中外交”处心积虑地要把中国东北肢解出去的阴谋宣告破产。

1929 年 7 月 2 日，因中内閣垮台。但是田中义一及其东方会议的侵华政策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中仍有极大的影响，一个武力侵占东把的阴谋在暗中酝酿着。



日本得寸进尺，中华战火四起

谁市兵逼能占则占

——日本侵华三段式

柳条湖的狼烟

1931年9月8日，沈阳城上空弯月如钩，繁星点点。柳条湖附近是黑压压的一片高粱。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借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来到东北军营南六七百米处的柳条湖。

河本亲自将骑兵用的小型炸弹放在南满铁路两根铁轨的接头处东侧单轨上，10点20分，河本点着了火。随着一声闷响，炸药爆炸了，铁轨被炸断1.5米，被炸断的铁轨和枕木碎片向四周飞去。这次

爆炸的规模很小，因为河本等人考虑不能危害正行驶的满铁列车，他们事前请工兵进行了精确的计算，根据预定炸毁的长度，确定使用药量。当晚10点40分，那列北来的高速火车，只是倾斜了一下，便顺利通过了。

爆炸之后，河本中尉边向北大营开火，边派人员通知埋伏在3公里以外的川岛大尉，贼喊捉贼地说：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了铁路，正在激战中。

而事先参与密谋的川岛，则一面通知上司，一面命令部下向北大营和沈阳进犯。

此时，等在沈阳日本特务机关的板垣，脸上流露出满足的微笑。他一边立即以代理司令官的身份命令日军第二十九联队攻击东大营，命令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攻击北大营，命令使用24厘米榴弹开炮；一边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作了如下报告：

“因中国军炸毁南满铁路，现已和北大营之敌进入交战状态，如果这样下去，将有受到优势敌军的围攻之虞，因此，步兵第二十九联队下令全力攻击沈阳，职为身历其境的本军参谋，已予允可，特此报告。”

深夜11点多,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回到旅顺,在得知板垣的报告后,当即用电话命令驻辽阳的第二师团立即向沈阳出动。12点,关东军司令部全体幕僚紧急集合,商讨对策。日本关东军最后下达了“全线出击,攻击奉军”的命令,同时决定司令部立即向沈阳转移。

就这样,以所谓“柳条湖事件”为借口,日军一手策划的“九·一八”事变揭幕了。这一幕决定了中日两国长达14年之久的命运,在中日关系史上投下一道绵亘的阴影。

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披露的史料证实,“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精心策划的预谋行动。

早在1929年5月1日,关东军“情报会议”就得出结论:张作霖死后,日本要解决满洲的问题,除行使武力之外,别无选择。7月,关东军参谋部就开始拟定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方案。1930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一阵又一阵所谓“满蒙危机”的叫嚷。满铁日人法西斯组织“满洲青年联盟”。在点东军唆使下,一边散发传单,一边派人到东京、大阪叫嚷:“在满洲的日本人的生存权”受到中国政府的“压迫”、“蹂躏”,现在濒临危机。如果朝野坐视,“帝国权益”将被消灭,“亡国的悲运必将笼罩祖国”。失掉“满蒙”会使新兴的日本受挫,日本将在全世界面前失去“所有

的光荣”。这个法西斯组织的代表遍访首相及内阁大臣,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

为了反“满蒙危机”的喧嚣进一步推和顶峰,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震太郎间谍事件”。

万宝山在吉林长春东北30公里。在长春日领事馆的唆使下,朝鲜人李升薰等来到该地,私自租得地痞郝永德转手租来的500垧地。在租约未经长春县政府批准的情况下,李升薰召来180多名朝鲜人凿渠,准备引伊通河水灌溉。5月,挖渠7里,损毁当地农户耕地19垧,并埋下汛期将淹没两侧数千垧农田的隐患。中国农民向县政府请愿,要求制止。长春县政府于24日命令李等停止不法施工。

6月3日,驻长春日本领事田代重德派日警赴万宝山马家哨施工现场,李升薰等仗势继续挖渠。田代向外务省献策:万宝山农田问题是“试金石”,应当采取“坚决保护措施”,将工程一气呵成,“造成既成事实”。外相币原批准日领事采取强硬方针。于是,田代增派日警,武装保护挖渠筑坝。7月1日,忍无可忍的中国农民400人涌到现场填沟。次日,当农民继续填土时,日警悍然开枪38响。接着,日警强占农舍,高悬日本国旗,蔑视中国主权,气焰嚣张。同一天,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朝鲜报纸刊发“号外”,造谣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害数万名,蓄

意煽动仇华情绪。3日,朝鲜境内主要城市一些不明真相者开始捣毁和抢掠华侨商店、住宅。尽管华侨和中国领事一再催促日本总督府和地方政府制止暴行,但他们故意不予理睬,听任排华暴行蔓延。据不完全统计,无辜华侨被杀达119人,受伤395人,失踪82人,财产损失极为严重。

“万宝山事件”一波未平,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发表公报,宣称:日本参谋部员、陆军步兵大尉中村震太郎一行“向洮南旅行”,被中国兴安屯垦军“非法绑架监禁”,遭到枪杀。

兴安屯垦区是东北地方政府明令禁止外国人进入的地方。1931年6月初,中村震太郎奉参谋本部命令,冒充“农学家”,偕退役军人并极延太郎一行4人,由伊力春都通过索伦前往洮南,从事间谍活动。被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发现,予以拘留。搜出中村携有枪支及日文/中文军事地图,上面有勾划的校正纪录。笔记本上记有兴安屯垦区的兵力、枪支种类、营房辎重分布、水源、气候以及蒙汉民分布的情况。屯垦军以证据确凿,认定中村一行是军事间谍,团长关玉衡下令将4名军谍犯处决。

按照国际法准则,主权国家有权处死敌对国家的军事间谍。中村等人构成军事间谍的证据确凿,况且东北地区当局有言在先,不准外国人进入屯垦区,中村等人罪有应得。

而日本帝国主义却无视这些事实，乘机掀起反华浪潮。事件发生后，关东参谋长三宅光治要求“满铁”提供人力物力，配合关东军对中村事件进行“武力调查”。关东军作战军主任参谋石莞尔认为中村事件是解决“满蒙”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并叫嚣要将日军开进洮南地区，受领中村等人的遗体，逼迫中国军队向日军谢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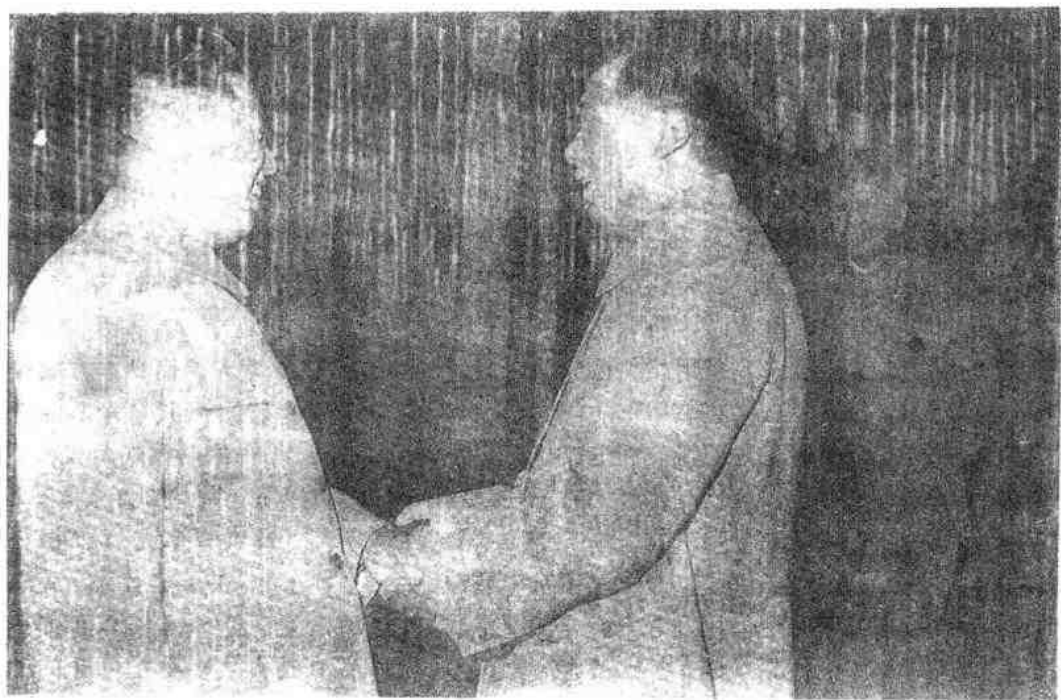
一切都预示着一场战火即将点燃。柳条湖事件，是日军精心策划发动战争的借口。

两广反蒋势力。7月12日，蒋致电张学良，称：“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27日又通电全国：“攘外应先安内。”在万宝山、中村事件后，日本军国主义明火执仗地声言动武，而蒋于8月16日再次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万勿抵抗，力避冲突。”张学良按照蒋的训令转示东北军各部严格遵守。

9月18日夜里，日本关东军向北大营中国驻军发动突袭，炮弹落在中国军队的营

六二一各团。

晚11点，中国第六二一团营房开始着火，11点半，日军增援部队赶到，由西南方的围墙冲进营内。在密集枪声的掩护下冲入北大营第六二一团各连兵舍。士兵们从睡梦中惊醒。由于枪弹锁在仓库里，没有武器，他们慌忙夺路而逃，来不及穿衣服，有的光着膀子，有的打着赤脚，狼狈不堪。日军在无人抵抗的情况下如入无人之境，见人就杀，有的士兵死守“原地待命”的命令，被日军活活刺死在床上。



蒋介石下令不许抵抗

当日本军国主义叫嚣“满蒙危机”，磨马霍霍之际，蒋介石正亲自统率30万大军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展开第三次“围剿”。同时，他还在对付

内，中国士兵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准备抵抗，许多士兵手指头还没扣上扳机就被敌弹打中，但中国军官却不断发出不准抵抗的命令。

当时北大营驻防的是张学良麾下的陆军独立第七旅所属步兵第六一九、九二〇、

凌晨2时许，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不忍官兵就这样白白地送死，命令从南、北两面出击，由第六二〇团担任掩护。东北军同日军展开激战，战斗持续到3点多钟，东北军伤亡中校以下官兵290余人。第七旅在声援无望的情况下，

撤退到东山嘴子。

5时30分左右,日军占领了北大营,将武器弹药抢掠一空,并放火将其焚烧。

“九·一八”事变当夜,当时在沈阳的辽宁省政府主席藏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致电在北平的张学良,张学良向蒋介石请示。迭次明确指示对日本寻衅“不予抵抗”的蒋介石复电是:“相应处理。”张学良“不想扩大事件”,下达命令,“不得作报复行动”。藏式毅和荣臻等人便企图用交涉的方式解决事端。但是,日方丝毫没有遵循交涉途径解决问题的意向。

当日军大举进攻北大营时,藏式毅派人到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询问日军攻击的理由何在。

日本总领事馆的答复是这样的:

“本馆正向军方查询,现在还不明情由,所以无法奉告。”

“这样,中国方面遂通告日本领事馆:

“望于5分钟内制止攻击,并将日军行动真意答复。如逾时未得回答,中方则将通告驻沈阳各国领事,不能负保护外侨之责。”

5分钟后,日方答复:

“正在制止中,请再待5分钟。”

然而,时间过了12时,日本总领事馆却毫无消息。而日军的攻击范围却在逐渐扩大。

晚11点左右,日军对沈

阳城外东北面的兵工厂开炮轰击,并侵入西门外商埠地,开枪狂射,占领小西边门和西边门警察所,许多警察在未经抵抗的情况下惨遭杀害。

中国方面再次打电话给日本总领事馆,催促制止军事行动。

过了一会儿,日本宣布:

“现在军队已经出动,制止甚为困难。且军方行动,总领事无权制止,只有向军事当局提出要求。”

19日晨2时左右,日军进抵沈阳各城门附近。中国方面将日军的进攻状况通知各国领事,各国领事都天真地认为:“总不至于侵入沈阳城内吧!”

但是,历史又一次嘲笑了善良的人们。

日军第二十九联队在凌晨分兵三路,进攻沈阳。晨4时,日军登上西南角城墙,先用机关枪向城内扫射,然后在装甲车的前导下,大举向沈阳城发起进攻。

清晨6时左右,沈阳全城被占领。

东北军事机构要地、兵工厂、东三省官银号被日军包围。各机关建筑上,均贴上了“日本军占领”、“日本军之外禁止出入,违禁者射杀!”等标语,由日军站岗警戒。

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署名,反诬中国军队爆炸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的石印布告,赫然贴遍全城。

中午12时,宫本庄繁到

达沈阳城,设司令部于大和旅馆旁边的东拓公司内。

与此同时,驻在东北各地的日军也全部出动,向长春、公主岭、四平、铁岭、辽阳、鞍山、海城、营口、本溪、凤城、丹东和抚顺等地全面进犯,接着又向吉林进犯。

驻朝鲜的日本师团,此时也非法越境,侵入东北。

仅5天的时间,日军就占领了宁夏、吉林两省的大部分地区。

随着辽、吉两省的沦陷,大批的武器弹药、军用物质和财产被日军掠走。仅仅沈阳一地就损失步枪95000多架。日军利用这些掠夺来的武器和物质又向黑龙江进犯,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尽管主力已调往关内,但留驻东三省尚有17.9万人。仅辽宁、吉林两省驻军就有15万人。而日本方面仅有日军1个师团、6个独立守备队、1个旅顺重炮大队和关东宪兵队,共约2万余人。

日本军队之所以很快占领东北,并不是其武士道有什么了不起的战斗力的,而是因为中国军队接受了可悲的军令,没有进行任何抵抗。

李顿的调查报告中部有这样一段评论:“日军能毫不费力地占据满洲之大部分与中国军队毫不抵抗……使日本海陆军界相信中国军队战斗力极为薄弱……有关。”

不管对李顿调查报告书